论家庭政策的道德价值

李桂梅^①

摘要：家庭政策是国家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它有助于家庭发展和社会稳定，内含道德价值。这种道德价值主要体现为家庭政策促使社会道德具体化和现实化，提供道德建设的制度保障；促进社会治理，厚植道德建设的民生基础；增强执政合法性，夯实道德建设的政治基础；加强家庭教育功能，奠定道德建设的主体基础。家庭政策只有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符合社会的道德要求，才能实现其道德价值。

关键词：家庭政策 道德价值 社会治理

家庭政策是政府社会治理的工具，它调节国家和家庭等利益关系，替补和完善家庭功能，促进家庭能力的发展，提升家庭成员的福利水平，推动家庭和社会的和谐，内含道德价值。具体而言，家庭政策的道德价值是通过它的导向功能、约束功能、调控功能、分配功能而实现的。政策的导向功能是指政策引导人们的行为或者事物的发展朝着政策制定者期望的方向发展。约束功能是指为避免社会发展中的不利因素出现，政策对目标群体实行控制，即对某种行为给予物质或精神方面的奖励或惩罚，达到约束效果。调控功能是指通过政策对社会中的利益冲突进行调节与控制，协调社会利益矛盾。政策的分配功能是指政策必须对公共利益进行合理分配，保障利益分配的公正。家庭政策只有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真正为百姓带来福祉，才会对道德产生积极的价值，避免带来道德风险。具体而言，家庭政策的道德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促使道德具体化和现实化，提供道德建设的制度保障

从本质上说，政策是国家为了一定的目标而进行的社会资源的配置和社会利益的分配，政策的制定、执行等活动都因为人及其利益的存在而必然存在道德问题，必然打上人的价值理念的烙印，受到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的制约。家庭政策本身也是事实取向与价值取向的统一。社会主义的家庭政策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南，运用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和整合作用，对其目标、过程及其执行效果进行追问，以保障家庭政策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一个真正的制度应当包含自己的道德取向。一旦国家施行的制度没有蕴涵着道德的价值取向，就会“导致一个根本不宜称为法律制度的东西”^②。罗尔斯认为，制度“不仅建立在

^①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长沙 410081）。

^②李龙．西方学名著提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529

经济的基础上，而且建立在道德和政治基础上”^①。任何制度的建立都是以一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道德为基础的，应具有善的价值。制度必须合乎伦理，必须把社会道德规范和要求融入制度中，以达到引领思想和规范行为的目的。具体而言，家庭政策要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的社会道德贯穿于其中，使之成为指导家庭政策制定的价值理念，使抽象的社会道德观念在家庭政策中得以具体化、外在化和现实化，成为人们可以感知的现实形式和看得见的具体符号。家庭政策本身就是家庭道德制度化的产物，家庭政策实践形态是家庭道德的具体应用。

美国学者L. 彼彻姆指出：“因为法律常常以一定的道德信念为基础———这些道德信念指导法律学家制订法律———所以法律能够使道德上已经具有最大的社会重要性的东西形成条文和典章。”^②家庭政策的建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制定和实施制度的过程，是一定社会主流道德价值观念不断呈现与固化的过程，更是政策所选择和内含的道德价值理念逐步成为社会所大力倡导和为公众所接受的基本价值理念的过程。家庭政策是对社会和家庭问题的回应，它服务不同家庭和不同成员，将社会中适应社会发展趋势的道德价值理念通过政策这一具体载体上升到国家的层面，使其合法化和制度化，并逐步使其普遍化，为社会公众所理解。因而家庭政策也就相应成为一个社会新道德产生的助产士，为新道德的产生发展提供条件和支持，拓展新道德的生存空间和舞台，并随着政策的实施对新道德产生持续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破除传统社会的男尊女卑观念，将女性从封建道德枷锁中解放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规定了男女平等的原则，随后又出台了一系列的促进男女平等和保护女性权益的法规。随着政策法规的贯彻实施，男女平等观念已被人们广泛认同，性别平等的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开始确立。家庭政策对于消除封建道德，建立社会主义新道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家庭政策具有道德导向性。正是由于家庭政策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它对社会或家庭道德具有强化和导引的重大作用。政策是政府依据法定程序，以规范性的成文形式向社会公开发布的权威性的行为准则，“具有禁止政策制定者所不希望的行为发生的制约性功能，引导组织和个人朝着政策制定者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的导向性功能”^③。而且政策对行为的制约和控制可以通过利益的手段进行。对遵守政策的公民，给予物质或精神的奖励，使他们得到所期望得到的东西。对违背政策的公民，则用惩罚措施剥夺他们所不愿失去的东西，这种赏罚具有硬约束的性质。政策以其权威性和利益奖惩机制为家庭道德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价值导向和外在支撑。因此家庭政策一出台自然会受到公众的普遍关注，并接受公众持续的道德审视和质询，这意味着家庭政策既可能会对社会道德产生积极影响，也有可能使社会道德面临着某

^① [美]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 [M]. 何怀宏, 何包钢, 廖申白,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251

^② [美] 汤姆·L.彼彻姆. 哲学的伦理学——道德哲学引论 [M]. 雷克勤, 郭夏娟, 李兰芬, 等,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17

^③ 钱振明. 公民道德建设: 现时代政府的新职能 [J]. 中国行政管理, 2002, (2).

种风险。一个反映社会主流价值观导向、满足家庭意愿和需求并被社会认可的好政策，必定会对社会道德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在人们心目中留下美好的道德记忆，同时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道德风尚，推动社会道德的进步。因为家庭政策价值目标为道德的善提供了可操作的尺度和标准，政策中所内含的并被明示、确认和强化的社会道德规范也就自然成为社会的评价和选择准则，并随着政策的不断推进和实施，这种道德规范逐渐为社会大多数人所认识、接受和认同，成为个人行为选择的指南并内化为个体的道德信念。家庭政策是支持社会道德价值理念、规范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在社会利益调节和精神引领中起着重要作用，并不断滋养着公民的德性。反之，如果家庭政策与社会主流道德价值观不符合，那政策就会存在道德风险，即对道德产生负面的作用，甚至削弱已取得的社会道德建设的成果，造成难以挽回的消极影响。

20世纪80年代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改变了人们的生育价值观。人们抛弃传统的“多子多福”生育道德，转而树立提高人口素质，控制人口数量的生育道德。计划生育政策实行时期的“一孩半”政策（农村地区第一胎生育女孩的夫妻在间隔几年后可以生二胎的政策），尽管从主观来讲，这一政策并无任何性别歧视的意图，是为了在保障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兼顾和满足群众的愿望和需求，是为了满足女孩家庭的劳动力需求并使养老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但“一孩半”政策是基于第一胎是女孩的事实，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男孩偏好，使胎儿和幼儿的性别平等问题凸显。它虽然并不赞成传统的“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道德观念，却对这些传统习俗和观念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它虽然提倡男女都一样、生儿生女无差别，但却在无意间传递出男孩与女孩不等价的意识，对社会道德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政策都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出台的，难免具有时代的局限性。随着社会的变化，一些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政策必须进行调整或终止，一些不完善的政策必须进行修改。当前由于社会的转型以及家庭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家庭政策还存在滞后家庭生活的现象，需要以社会主义道德为价值取向进行修改完善，真正使政策成为社会道德建设的制度支撑。如我国儿童福利政策作

为一种修补型家庭政策，受益人相对较少，且没有延伸到儿童抚育的家庭事务，已经无法应对当今的家庭抚育问题。为完善儿童福利政策，应树立的一个重要价值理念就是生儿育女绝不是单纯的家庭私事，同时也是国家大事，政府在儿童保护和儿童福利问题上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建构以儿童为中心、以政府为主导的福利政策，降低家庭的生育养育成本。政府必须使家庭道德中的抚幼爱幼在具体的政策中变成看得见和摸得着的措施。如此才能真正发挥家庭政策的价值导向和制度保障作用，增强社会道德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强化家庭的繁衍后代、抚幼爱幼的社会功能。

二、促进社会治理，厚植道德建设的民生基础

家庭政策是伴随着工业社会和现代社会而产生的。工业化和市场化在带来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丰厚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困、失业、伤残、养老等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无法仅仅依靠个人、家庭与企业解决，需要国家采取多种途径和方法加以介入。传统社会个人的生老病死问题主要是依靠血缘和地缘共同体如家庭、家族和乡邻来解决，这些共同体承担了帮助人们应对各种社会风险的责任。进入现代社会后，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性增强的风险社会和陌生人社会，遭遇的风险更大、更多而且更不可控，尤其在大灾大难来临时，个人和家庭的力量愈显薄弱，原来的共同体无法应对这些困难和风险，制度化、专业化和组织化的慈善和救济随之而产生。家庭政策就是其中解决问题的行动计划之一，它通过政府调集社会力量，采取制度化的措施、运用公共资源帮助弱势群体，解决其基本生活困难，保障其基本权利。早期的家庭政策基本上是补救型的，目的是使失业、贫困等不至于酿成更大的社会问题从而危害社会。因而家庭政策产生之初就具有社会治理的功能。

社会治理是社会政策的本质属性。社会治理的实质就是政策治理，家庭政策则构成社会治理体系的基础。家庭政策是国家干预家庭资源与家庭行为的治理模式，也是国家旨在影响和改变家庭生活模式的原则和程序，是政府职能的体现。政府通过与社会组织等联合共同解决家庭问题，以维护家庭、社会秩序和社会和谐，在这点上家庭政策已成为有效的治理手段和行动计划。具体而言，家庭政策要达到社会治理的效果，主要依赖四个方面：政策的制定、政策内容、政策的实施和政策实施的结果。第一，政策制定的过程。在现代治理理念视域下，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治理取代了一元主体主导的社会管理，并成为社会行动的重要范式。家庭政策制定出现主体多元化的趋势，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和家庭，尤其是利益相关者在政策制定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并以伙伴的关系整体性参与其中。家庭政策的制定过程如果吸纳了相关利益方参加，并且认真吸取他们的意见，尤其是政策对象群体的意见，这样的政策就具有较强的治理色彩。第二，政策内容。政策的内容如果能实现政府意志与家庭合理需求的同构，必然能够达到治理效果。政策的内容反映政策对象的需要，而且政府认可其合理性，可以动用公共资源予以满足，特别是政策如能帮助弱势家庭解决基本生活困难，其实施结果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社会公正有预期的贡献。第三，政策的实施。政策的实施既是政府责任部门系统有效运行的过程，也是政府与政策对象互动和共同行动的过程，双方共同行动的性质、行动的具体形式及相互的角色和体验都在具体建构着社会治理。第四，政策的实施结果。政策的实施真正解决社会和家庭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就达到了社会治理的效果。总之，家庭政策的社会治理功能的实现是政策制定的社会治理、政策实施中的社会治理和政策实施结果的社会治理效果的综合作用。^①

中国现在面临着快速的市场转型和社会转型，家庭在这个转型过程中面临严峻挑战，需

^①王思斌. 略论社会政策的社会治理功能 [J]. 社会政策研究, 2016, (1).

要制定和实施积极的家庭政策以解决社会和家庭问题，达到社会治理的效果。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价值目标就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在解决和改善家庭的民生问题上实施了一系列的重大举措和行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社会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转变，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我们也要看到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还有相当数量的困难家庭，还面临许多社会问题，民生还是政府应该摆在突出位置的问题。政府通过完善家庭政策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已成为当今社会化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的必然选择。

基于上述背景，我国家庭政策应当以促进社会进步和公正为宗旨，增进家庭利益，提高家庭能力。当前需要重点解决弱势家庭的社会保障问题，保护弱势家庭的生存和发展权利，改善他们的生存处境，使他们获得人格尊严。政策制定者要有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和态度，理解和关心弱势和困难家庭，让他们有充分表达自己意愿和需求的机会，真正为他们着想，在家庭政策制定中体现和维护他们的利益。如果家庭政策对社会弱势和困难家庭的问题不管不问，对他们缺乏应有的人道关怀，我们的社会治理就失去了基本的价值和道德基础，社会风险就会增大，社会安全也就无法保障。“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这个观念就是要按平等的方向补偿由偶然因素造成的倾斜。”^①家庭政策的设计应该将改善社会最不利者的家庭生活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将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转化为具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这是服务型政府必须履行的政治和道德义务。同时要关注家庭福利的普惠性，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住房、教育和医疗等急难愁盼问题，这样才能很好地满足家庭及家庭成员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期盼，也为社会治理打下良好的基础。在家庭政策的实施中政府必须树立服务意识，破除政策是上对下的关怀和恩赐的错误认识，更加关注政策对象的获得与感受。

贯穿社会主流道德原则的家庭政策聚焦家庭的民生福祉，努力提高保障能力，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提供优质、公平的公共服务，“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②。社会治理的成效奠定了人民群众践行社会主义道德的民生基础，使人民群众能够进一步理解、认同和内化政策所蕴含的社会道德，自觉按照道德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

三、增强执政合法性，夯实道德建设的政治基础

任何政党要取得和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都必须寻找自身执政的合法性。“合法性是政

^① [美]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 [M]. 何怀宏, 何包钢, 廖申白,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96

^②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N]. 人民日报, 2022-10-26.

治生命力的根本性、决定性的因素。”^①“政治学中的所谓执政‘合法性’，主要不是法律规范和法律原则意义上的‘合法’，而是指执政党控制和运作政治权力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即必须得到社会成员充分的认同和支持。”^②合法性的实质就是政党及其政权被公众接受和认可的状况。一个政党要想在执政后继续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就必须持续不断地积累和拓展其合法性资源。因为“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③。合法性本身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历史的合法性和现实的合法性不等于未来的合法性，它需要执政党居安思危，确立正确的执政理念，加强自身建设，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夯实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

家庭政策是政党建立和维持执政合法性的基本工具。政党执政合法性资源主要有意识形态、经济绩效、执政党自身建设等。其中意识形态是政党执政合法性的理论资源，经济绩效是政党执政合法性的物质资源，自身建设是政党执政合法性的主体资源。经济绩效在政党执政合法性系统中处于基础地位，对加强和巩固政党执政合法性具有重要价值。一个执政党如不能提供最基本的执政绩效，这个执政党就失去了履行职能的执政能力，无法维护其地位，将面临丧失执政合法性的危险。而家庭政策是体现政党执政绩效的主要载体，“政策是执政的生命，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是执政党提供政治供给最主要的方式”^④。政府是制定家庭政策的核心主体，政府作为功能性实体，通过公共权力的运用，制定家庭政策来分配社会资源和协同各方利益，以达到修复家庭功能，增强家庭发展能力，维护家庭和谐与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公正和发展的目的。因而家庭政策本质上是社会福利政策，是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已成为能够改变政治格局中力量对比的杠杆，对于取得和维系政治权力越来越重要。20世纪以来，各国政党的政治纲领和政府的施政纲要都把家庭福利政策作为重要内容。家庭福利政策也因政治需要不断发展，并在政治实践中作为预防性对策加以广泛应用，形成福利国家。福利国家既是国家体制又是社会福利制度。作为国家体制，其社会治理的政治基础是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原则，它最大限度地调节各阶级、阶层和不同利益集体的矛盾，保护劳动者和弱势群体的利益。作为社会福利制度，它是通过国家政治力量对市场和商品化的干预，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利益，并将社会福利上升为政治要求，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独立系统，影响政治进程。

现代社会的政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依据是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公共福祉的提高。历史事实证明，只有国家经济得到发展，民众真正享有利益和实惠，才会认同和拥护执政党。因

^① [美] 罗伯特·杰克曼. 不需暴力的权力：民族国家的政治能力 [M]. 欧阳景根，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122

^② 中共中央党校. 执政党建设若干问题研究 [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 35

^③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④ 刘世军.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N]. 光明日报，2017-01-23.

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①。否则执政党执政合法性就失去了实质性的支撑，有关合法性的所有说辞都无法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曾指出，经济发展速度“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②，“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③。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民生是最大的政治，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这两个最大的政治是可以相通和统一的，只有不断发展民生才能赢得民心，而任何政党、政权的前途命运都是由其人心的向背所决定的。因而民生问题关系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关乎国家的政治安全，它不仅仅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所有民生问题的解决都要通过家庭政策这一环节，家庭政策是政府治理社会问题的实践和策略，将社会政策尤其是家庭政策作为政府争取民众支持的重要手段，已成为现代政治活动的突出特点，政党执政的合法性需要通过现实的执政业绩来加以证明。^④

家庭政策的效果直接影响执政合法性的根基。众所周知，公众大都是直接从家庭政策实施的成效去评判执政党的业绩，感知执政党的执政价值理念。家庭政策关系到家庭及其成员的切身利益，公众对它实施效果的感受最直接、最真实、最强烈，它也最能影响公众对政府执政的道德评价。公众认为好的家庭政策就是能符合人民意愿和满足绝大多数家庭及其成员需要的政策。好政策体现和连接着民心，而民心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定心丸。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坚持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实践，随之而来的就必然是人民对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价值取向的认同和拥护，如此政党执政的基础才会永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⑤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一方面一心一意谋发展，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家庭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为满足家庭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更强大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不断健全家庭政策，充分发挥家庭政策的利益整合功能，缩小贫富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努力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都有获得感、满足感和幸福感。从目前来看，我国的社会福利水平还需不断提高，还必须强化政府的福利支出责任，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在满足家庭物质利益的前提下，努力满足家庭成员的政治、文化、精神和心理需求。家庭政策要特别关注社会的弱势家庭和困难家庭，使他们获得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及时的有效救助。政策只有真正维护家庭及家庭成员的利益，才能有效发挥其形成社会共同利益和凝聚力的作用。与此同时，人民群众对政府和国家的政治认同和支持才会逐渐增强，政党执政合法性的根基才能稳固，国家提倡的道德价值理念才会为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地拥护、赞同并积极遵守。

^①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7

^②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54

^③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70

^④刘歆立. 公共政策道德性及其意义初探 [J]. 重庆社会科学，2005，（7）.

^⑤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2021-07-02.

四、加强家庭教育功能，奠定道德建设的主体基础

家庭是个体生命的起点，个体在幼年时期与家人形成的社会关系对他们的心理倾向、行为习惯和品性的形成有着先导性、深刻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伴随着孩子的一生，相比其他的教育，家庭教育对人的道德发展的作用和意义更为重要，更为持续和长久。家庭政策通过为家庭提供实物、资金和各项服务支持来确保家庭教育功能的发挥。

家庭政策有助于儿童抚育，培育孩子健全的人格。保护儿童和促进儿童身心健康是各国政府最早采取的社会福利之一，也是家庭政策建构初期的主要内容。但是最初的家庭政策只是针对那些失去家庭依托或受到伤害的儿童的救助工作，把家庭与儿童割裂开来。现代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人类生命的最初三年对其今后的发展和成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儿童的需要与家庭的需要密不可分，帮助家庭就是帮助儿童，不能帮助家庭就不能有效帮助儿童。^①儿童只有生长在功能正常完整的家庭里才能健康成长，反之，一旦家庭功能无法正常发挥，儿童成长就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

家庭政策为家庭提供福利和服务，把保护儿童和支持关心儿童成长作为政府和社会的责任。我国专门针对儿童权益保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提出最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原则，强调了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第一责任，明确政府职能部门的具体职责，为未成年人提供全面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确立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及其细化规则，最直接的表现是它保证了离婚后母亲对未满两周岁子女的直接抚养权，并尊重已满八周岁子女的真实意愿。同时，该法放宽了被收养人的年龄限制，只要是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均被纳入被收养范围，删除了过去收养法的未成年人限制为“不满十四周岁”的规定，以使更多的未成年人能得到家庭的关爱，保障他们的健康成长。

家庭政策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素质。家庭担负着提高劳动者素质的任务。随着社会的发展，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要求劳动者拥有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要求劳动者具有人际沟通的能力、团队合作精神、领导能力等，更为重视劳动者的价值观念、精神、情感等因素，这些构成了劳动者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更突出家庭教育的重要。如果说人的知识和技能主要来自学校和其他机构的教育的话，那么人的思想价值观念、习惯和品质等则更多地与家庭关联，更多地来自家庭的熏陶和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家庭教育的结果。因而家庭政策在营造和谐的家庭关系、提升父母的教育素养、发挥家庭以德育人功能上都有具体规定，以为家庭教育提供最大可能的帮助。一直以来我国的家庭政策都关注家庭的教育功能尤其是道德教育功能。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就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家长对子女应尽的家庭教育义务。2022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在家庭教育内容的规定方面更是突出“以德为先”，强调对未成年人道德品质的培养。

家庭政策有助于造就合格公民。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的发展，公民社会的重要性

^①张秀兰，徐月宾．建构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J]．中国社会科学，2003，（6）．

日益凸显。一个积极活跃的公民社会是社会民主和可持续发展实现的基本保障。在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多种因素中,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公民的参与。公民社会的核心就是公民个人角色能否发挥作用。家庭对公民不同生命阶段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它不仅关乎个人的幸福,而且影响社会整体的发展。政府制定家庭政策来分担抚育子女的责任,已经反映出国家并未完全将家庭视为私域,而是将家庭看作对公民社会化尤其是政治社会化有重大影响的组织。正如迈克尔·罗斯金所说:“孩子们所遇到的每一个场所,都是政治社会化的潜在机构,但是最早遇到的家庭具有其他任何机构所不能比拟的作用”^①;“家庭塑造了个体的心理特征,它决定着我们的政治态度,传递一套规范和价值(包括政治内容),以及信念和态度(如政党忠诚感和对政府的信任或不信任)”^②。家庭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已将其蕴含的国家政治价值观念悄然地传递给了下一代,形塑了他们的政治价值观,目的是使他们成为合格的公民。

家庭及家庭教育对道德主体的培养有着重要的作用,家庭教育的地位和价值也得到政府的高度认可,家庭政策不断出台,促进和推动了家庭教育的发展。但不可否认的一个现实是,我国的家庭教育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家长的“教育焦虑症”演变成了“群体性焦虑”。这既显示家庭教育责任的重大,又充分说明家庭和家長担当责任的能力和信心严重不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③

第一,家庭在剧烈的社会转型中一直处于被动的客体位置。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这既说明了家庭的基础性地位,同时也使家庭容易被工具性定位。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家庭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家庭的发展,如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体系。但家庭也常常作为国家经济、人口和社会管理的工具,处于边缘位置。

第二,家庭中的个人主义观念增强。现代社会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家庭成员的个人权利思想越来越彰显。家庭教育是建立在家庭成员特殊的亲密关系基础上的,但这种个人主义化的家庭关系弱化了家庭的亲密关系,影响家庭教育的开展,使得家庭成员之间很难进行深入的交流和沟通,家长难以进行价值观、道德情操等方面的指导,家庭教育的难度加大,亟需国家在家庭政策方面发力,帮助家长提高教育素养。

第三,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职责相互混淆。按照现行的家庭政策及家庭教育指导文件的规定,家庭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家庭道德教育,这是全社会的共识,家长们也高度认同。但目前的状况是学校教育的职责向家庭教育转移,家长不得不承担一部分学校教育的职责。而主要由家庭教育承担的道德教育在今天强大的智育教育面前,也面临着强烈的冲击和影响。

面对家庭教育的孱弱,家庭政策提供了制度资源的保障。

一方面,在家庭政策制定上树立家庭是具有公私两重性,具有工具性和目的性的社会单位的价值理念,从根本上确立家庭教育的主体性。当前家庭教育存在依附于社会、学校,以

^① [美] 迈克尔·罗斯金,等. 政治科学 [M]. 林震,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143

^② [美] 迈克尔·罗斯金,等. 政治科学 [M]. 林震,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143

^③ 余清臣. 面向立德树人的当代中国家庭教育:挑战与治理 [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

满足外部的期待和诉求为先的倾向。因此家庭政策对家庭教育功能的理解、指导和支持必须遵循家庭教育的属性和内涵，遵循家庭生活化的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对家长、政府、学校及社会在家庭教育中的地位和职责做出规定，坚持家庭主体、国家支持、社会协调参与的原则，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是家庭教育的责任主体。家庭教育立法后，家庭教育已由家事上升为国事，政府一系列的支持举措必不可少，学校和其他社会力量有配合与协助家庭教育的责任。

另一方面，通过家庭政策完善制度资源方面的供给，为家庭教育提供保障。从国家资源层面来看，我国高度重视学校教育，绝大部分政策资源是给予学校教育的。相反，对家庭教育的关注和支持远远不够，给予家庭教育方面的资源相对比较缺乏，而且还有一部分人错误地将家庭教育看作家庭内部的事务。当前政府部门人员应认真学习并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提高对家庭教育的政治站位。要通过家庭政策对家庭教育进行统筹规划，加大资源供给，完善配套措施，改善家庭教育的外在条件和环境，为家庭教育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尤其要对困难未成年人家庭、留守未成年人家庭的教育工作进行精准的服务和指导，建构有效的家庭教育扶贫政策，帮助家庭切实发挥家庭教育的价值引领和道德品性培养的作用，为社会道德建设培育人格健全的主体。

参考文献：

- [1] 李龙. 西方法学名著提要 [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 [2] [美]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 [M]. 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 [3] [美] 汤姆·L.彼彻姆. 哲学的伦理学——道德哲学引论 [M]. 雷克勤，郭夏娟，李兰芬，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 [4] 钱振明. 公民道德建设：现时代政府的新职能 [J]. 中国行政管理，2002，（2）.
- [5] 王思斌. 略论社会政策的社会治理功能 [J]. 社会政策研究，2016，（1）.
- [6]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N]. 人民日报，2022-10-26.
- [7] [美] 罗伯特·杰克曼. 不需暴力的权力：民族国家的政治能力 [M]. 欧阳景根，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 [8] 中共中央党校. 执政党建设若干问题研究 [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
- [9]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0] 刘世军.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N]. 光明日报，2017-01-23.

- [1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2]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13] 刘歆立. 公共政策道德性及其意义初探 [J]. 重庆社会科学, 2005, (7).
- [14]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1-07-02.
- [15] 张秀兰, 徐月宾. 建构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3, (6).
- [16] [美] 迈克尔·罗斯金, 等. 政治科学 [M]. 林震, 等,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1.
- [17] 余清臣. 面向立德树人的当代中国家庭教育: 挑战与治理 [J].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1).

转引自《道德与文明》2023 年第 6 期